

永志不忘

——我的记者生涯

〔苏〕 鲍·波列伏依



永志不忘

——我的记者生涯

〔苏〕鲍·波列伏依



新 华 出 版 社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САМЫЕ ПАМЯТНЫЕ. ИСТОРИЯ МОИХ РЕПОРТАЖЕЙ
“ОКТЯБРЬ” № 1, 3, 6. 1979
根据苏联《十月》杂志 1979 年第 1、3、6 期译出

永 志 不 忘
我的记者生涯
〔苏〕鲍·波列伏依 著
徐 耀 魁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265,000 字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03·010 定价: 1.10元

译者的话

鲍里斯·波列伏依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的小说《真正的人》和《我们是苏维埃人》等，早已被介绍到我国，是我国广大读者和作家所熟悉的。他是通过新闻界进入文坛的。他以写特写著称。

这部书是他的近作，是作者五十多年新闻生涯的记录，是他成长过程的总结。这部文艺性回忆录共分三部。第一部介绍了他从发表第一篇《最初见报的七行半》的通讯（年仅十四岁）到卫国战争爆发前这一阶段的新闻活动。第二部记述了他作为《真理报》的军事记者，在卫国战争期间随军采访，进行战地报道的四年战斗生活。第三部讲述了他战后周游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和平时期的新闻采访工作。

从作者的回忆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新闻工作者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进行采访，怎样寻找题材，怎样提炼素材和怎样进行文学创作的。它对于我国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工作的同志，以及文学爱好者，将不失为一本有益的读物。

由于原书篇幅较长，翻译时删去了个别章节和段落，谨在此一并说明。

译者

1980.9.于北京

返老还童度盛年，
往事桩桩忆犹新^①...

亚历山大·普希金

① 这两句诗出自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译者

注

目 录

第 一 部

1	我是新闻工作者·····	(1)
2	最初见报的七行半·····	(2)
3	饶尔季科沃教堂的秘密·····	(10)
4	我的课业·····	(21)
5	阿列克塞·卡普斯廷的新主意·····	(26)
6	坟墓中的报道·····	(31)
7	我深入底层·····	(41)
8	卡普斯廷亲自打排我的通讯·····	(51)
9	高尔基的鼓励·····	(60)
10	作基奥的助手·····	(70)
11	千万人的公约·····	(76)
12	在加里宁身边度过的一天·····	(84)
13	鲍·卡姆波夫署名的消逝·····	(89)
14	在“一号办公室”写成的特写·····	(98)
15	炮捻儿·····	(107)
16	因祸得福·····	(113)
17	在哈里廷娜·莫里亚科娃家作客·····	(120)
18	水下游记·····	(127)
19	走进作家的行列·····	(133)

第 二 部

1	一篇通讯的运气·····	(141)
2	在教堂中的采访·····	(148)
3	司令员的文章·····	(156)
4	上伏尔加密林中的贞德·····	(162)
5	游击队员施同志·····	(172)
6	Der schwarze Tod·····	(183)
7	携带黄金的人·····	(193)
8	语重心长的教诲·····	(203)
9	斯大林格勒人的誓言·····	(211)
10	一篇没有被采用的通讯的故事·····	(226)
11	易北河会师·····	(239)
12	一篇待续的通讯·····	(255)
13	最后一篇战地报道·····	(261)

第 三 部

1	黑色头巾的村庄·····	(278)
2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教诲·····	(291)
3	无脚飞行员重踏征途·····	(303)
4	突然再现的幽灵·····	(316)
5	准确，准确，再准确·····	(326)
6	真正的题材·····	(334)
7	尼洛夫娜的儿子·····	(346)

8	白色纪念碑·····	(356)
9	西古尔温·艾苏拉尔森的地图·····	(369)
10	鲁滨孙的后代·····	(377)
11	勃奇金工程师的第九个海·····	(387)
12	宿愿得偿·····	(396)
13	与米诺妥共进晚餐·····	(410)
14	三十五年过后·····	(422)
15	生活是创作的合作者·····	(434)

第 一 部

1 我是新闻工作者

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说，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新闻工作者，那他的生命就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十年计算，而是以通讯报道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的，最复杂的，或者说最成功的文章，就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

我从事新闻工作已半个多世纪了。在本书中，我想讲一讲在我一生中起过突出作用、而至今仍铭记在心的那些通讯报道。不，不，这不是一本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业已装帧成书的特写或随笔的文集。真正的新闻文章只能是为报纸而写的，离开了报纸它就失去了生机。在我写作的所有年月里，我从未打算把自己的通讯汇编成册。不能象节俭过日子的家庭主妇那样，把几天前炸好的肉丸子热一热拿来款待客人。本书不是一部文集。

这是一部有关这些通讯本身、通讯的写作以及它们发表前后的形势的回忆录。在这些永志不忘的通讯中，有成功之作，也有败笔，还有一些由于某种原因未能问世，因此为读者所不知晓。但本书中谈到的所有文章，都给了我以某种教

益，为我开拓了新的境界，因此，这些东西对我——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终生难忘，倍感亲切。我下边所要谈的就是这些内容。

2 最初见报的七行半

一个记者很难描写自己，正象一个外科医生很难给自己做手术一样。不过，在战争的日子里，在紧急的情况下，这样的手术还是做过的。我也来试一试。

我是1908年3月17日生在莫斯科的，但我是在特维尔市(现在叫加里宁市)长大的。在那里读的书，参加的工作，选择了新闻这一职业，在那里写出了我的第一部书，因此，我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特维尔人，也就是加里宁人。

我的父亲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卡姆波夫，他是个法学家。他于1916年患肺病去世。父亲的样子我还依稀记得。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边收藏着所有俄国和优秀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而在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的时候，又在那里发现了好几本旧版的革命书籍。从这一点来看，以及从我妈妈(她在年轻时就守寡，后来一直未改嫁)讲的故事来看，我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的口味爱好一直是我们家中所有好事的标准。

妈妈通常这样讲：

“这本书你爸爸喜欢看。”

于是我马上打开这本书。这样的书差不多总是值得一读

的，总是引人入胜的，即使现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仍这样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向我推荐的作家中，只有一人我不喜欢，那就是兹拉托甫拉茨基^①。他那温存的、甜言蜜语的大作，我在童年时就觉得沉闷，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是我那位多愁善感的母亲说了谎，将自己的爱好冒充为父亲的。

我的母亲叫丽吉娅·瓦西里耶夫娜·卡姆波娃。1912年（那时她已结婚），她成了高等女子专修班的第一届毕业生。获得医学毕业文凭之后，她和我父亲一起来到特维尔，到一家大纺织厂的医院当医生。那是莫洛左夫家族开设的一家综合工厂——特维尔纺织工业公司。

父亲去世后，我们搬进这家工厂的大院里，住在所谓的“职员之家”。我的童年和青年就是在这家工厂的大院里度过的。革命后，这家工厂改名为特维尔无产阶级纺织厂，后来人们索性称它为无产阶级工厂。

在我们家里，由外祖母操持家务。她身材矮小，有点干瘦，腿脚微跛。她是一位善良的，但又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女人。不仅我和在我们家长大的我的表兄表弟，还有我们工人宿舍的近邻好友（其中有的人个性相当强），都有点怕她，也都尊敬她。而我妈妈，据我所记，一天到晚总是埋头于医院的杂七杂八的事务和一些社会活动，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她是通过外祖母来教育我和我的表兄弟的。

^① 兹拉托甫拉茨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45—1911)，俄国国民粹派作家。——译者注

我一天从早到晚和伙伴们或者在工人宿舍里，或者到与无产阶级工厂毗邻的红色工人村的街道上去玩。我们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在草地上踢球，在齐马卡小河里游泳和阅读父亲留下来的图书，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与我一起玩的那些朋友，也在外祖母萨莎的严密监视下同我一道看书。尽管母亲终日忙碌，但她还是抽空关心我们的学习，并给予指导。我最初阅读的是果戈里、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波米亚洛夫斯基^①等人的作品，以后又读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库普林、尼基丁、加尔申、苏里科夫、列维托夫、马明-西比里亚克、伏尼契、斯切普尼亚克-克拉甫钦斯基、格列勃·乌斯宾斯基^②（读他的书很费劲，可终于胜利地读完了）的书。也读了契诃夫的书，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首先从他的作品集中挑选他的《五光十色的故事集》来阅读。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我从小最喜爱的作家。爸爸妈妈还在大学时代就对他很敬佩。他在革命前出的各种版本的书，在我们家图书室的书橱里几乎全有。在七八岁的时候，我读了妈妈给我推荐的《契而卡什》。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被他的书迷住了，渐渐地读完了高尔基的全部作品选，包括书信和论文，这类文学，少年一般是不读的。

① 波米亚洛夫斯基，尼古拉·盖拉西莫维奇(1835—1863)，俄国作家。——译者注

② 除伏尼契(1864—1960)外，这里提到的人，都是俄国作家或诗人。伏尼契是英国女作家，《牛虻》一书的作者。——译者注

很难说出为什么，但我想，正是在高尔基作品的影响下，也许，是在他那浪漫式的作家生涯的影响下，我早在小学时代就向往新闻工作，——一项有趣的，迷人的，甚至是（那时我觉得）有点神秘的事业。

在学校里，我是墙报的最积极的学生通讯员（那时都这样称呼）。墙报上有一个讽刺专栏叫“梦中所见”。我在那一栏里发表一些极其辛辣的小品文，署名是“鲍·牛虻”。我在“梦中”见到的是五花八门的东西。因此，我在教师的眼里，就成了一个需要特别留意和注视的人物。有那么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小流氓（他是我在幽默栏里“梦见”过的人物），午休时在校园里把我狠打了一顿，妈妈不得不对“从楼梯上跌下”的儿子给以医治。可是以后，鲍·牛虻却自豪地带着那块青紫伤痕上学去了，似乎想证明：进行批评是有危险的，但也是有成效的。不过墙报毕竟是墙报。虽然鲍·牛虻在墙报上取得了某些成绩，但对他说来，这块天地太狭小了。他想入非非，要闯进真正的报纸。他想写特写、小品文、随笔，就象他所喜爱的高尔基从前在《高加索报》上写的那么出色。然而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材料，只是幻想而已。

若不是有一天俄国革命前著名的农民诗人斯皮里顿·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罗任^①到我们学校参观的话，我的理想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他是我们的同乡，住在离特维尔不远的尼左夫卡村里。从本世纪初他就在俄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作

^① 德罗任(1848—1930)——农奴家庭出身的“自学诗人”。——译者注

品。他的诗歌在所有的小学识字课本里都扎了根。他已成了评论界公认的著名诗人，受到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许多俄国大文豪的赏识，但他却从未离开过犁和耙，继续务农。他那通俗、朴实和严肃的诗句，我们大家早在一年级时就都学习过了。

这位不寻常的人在女校长马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沙拉莫娃和一些教师彬彬有礼地陪同下，登上了我们学校礼堂的讲台。他个儿不高，宽肩膀，一头白发披在双肩，一把胡须轻轻飘拂。他身穿一件深色的长礼服，脚穿一双“旧式的”扣着铁环的高鞣毡套靴。他走到台子边，用手捂着嘴，低声地咳嗽了一下，等掌声过后，他就以喇叭似的洪亮的声音，朗读起自己的诗来了。这声音真与他那年迈的身躯有点不相称。

当时我恍然大悟：命运给我送来了为真正的报纸写文章的好素材！难道《特维尔真理报》对著名的俄国诗人到第二十四统一劳动小学参观作客这个消息，能够置之不理吗？我蹲在讲台旁边，把笔记本往腿上一摊，就慌忙地写起来了。我尽力做到全神贯注，一事不漏。我甚至记得，那时把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都写上了：诗人虽已年迈，讲话时却声音洪亮，而朗诵诗的时候，声音低沉，仿佛是从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不时地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一条方格的大手帕，用力地往里擤鼻涕，然后再用它擦擦大胡子。

总之，这次出色的文学早会结束前，几何笔记本上已写得满满的了，而最后的一些材料都记在本子封皮上了。等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篇十分详尽的文章，作

者称它为特写，并冠以《不寻常的客人》的标题，然后又用工整的字体仔仔细细地誊写一遍。第二天放学以后，作者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通往二楼的宽大楼梯。这座昔日律师住的大楼，现在是省报《特维尔真理报》的编辑部。到这儿来的路我是熟悉的。我已不止一次拿着自己的作品光顾这里了，而每次必定为编辑部的纸篓增加一堆废纸。现在，我信心十足地踏着这条楼梯往上走。我带来了一篇特写《不寻常的客人》。我相信，这篇特写一定会为鲍·牛虻登上真正报纸的版面开辟一条道路。

啊！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我是怎样蹑手蹑脚地走向我一生中的第一个真正的编辑部！走廊里吸烟人的面孔，烟气腾腾和散发着印刷油墨气味的办公室，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编辑部里有一位不算年轻的秘书，他的鼻子红里透青，声音嘶哑，灰色的双眼如锡制的一般，手里握着一支神气的红铅笔。尽管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很忙乱嘈杂，但他竟能坐在那里不动声色。看样子，他除了那一张张刚刚印好的长长纸条（当时我已知道那叫长条）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惴惴不安地站在他那油光锃亮的办公桌旁，他当然也没有看见。

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咳嗽了一声，通报一下自己的到来。

“你有什么事？”他抬起那双锡一般的眼睛问道。

“有一份材料……一篇特写……非常有意思的特写《不寻常的客人》。”

“《不寻常的客人》。写的谁？”他头也不抬地问道，一边狠狠地勾掉了长条上的某些字句。

“著名的农民诗人德罗任。”

“德罗任？你认识他吗？在哪里认识的？”一双锡制的眼睛抬了起来，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的脸。

“他昨天到我们第二十四统一劳动小学参观，给我们讲了话，朗诵了诗。”

“好，放下吧。”

他满不在乎地拿过了我费尽心血写成的几页手稿，连一眼都不看，就把它塞进了他那神秘的办公桌上的纸堆里去了。他又开始读长条了，显然已把我忘掉了。我两只脚在原地倒换着站了片刻，然后鼓起了勇气，怯生生地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发表？”

“怎么，你还在这儿？”他惊奇地说。“这无法说。这要看你写的内容以及你写得怎么样了。等着吧。”

于是我就等起来了。每天放学后，我的头一件事，就是抓起报纸，四下搜寻。

“没有啊，没有，看你这个急脾气，”外祖母萨莎对我说，她通常是把报纸上的全部内容，从社论到广告，都要看一遍的。她已经知道我在等待什么，也在为我焦急。但是，她既没有看到吸引人的标题《不寻常的客人》，也没有发现具有浪漫色彩的署名“鲍·牛虻”，于是便尽力事先安慰我，以免我伤心。

“他们也许会发表的……经典作家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入

文坛的……就说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①吧，写了好几普特^②重的稿纸之后，他的作品才开始发表……涅克拉索夫，还有你写的那个德罗任，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位博览群书的外祖母引经据典，当然也没有使我得到安慰。我那篇漂亮的特写还是没有见报。我自忖：准是那位声音嘶哑、有一双锡一般眼睛的人，把那篇特写塞进一堆纸里就不管了。我也就听天由命吧！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德罗任，确确实实不是一下子就走运了的。不过有一天，外祖母萨莎手拿报纸向我走来。

“听我说，这里倒有一条关于德罗任的消息……不过没有署名。大既是你写的那个吧？”

我把书和笔记本往地板上一丢，一把抓过报纸。真的，在第四版上，在本市新闻栏里，有一条简讯。标题那是我早已熟知的。不过，我的那篇漂亮的特写被压缩成了整整七行半，我那引为自豪的署名“鲍·牛虻”不见了。不过我心里有数，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这就是我的那篇只有七行半的文章。

我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报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几行字。虽然这条简讯里只有一句话与我那篇特写中的原文一字不差，但我还是欣喜若狂：这就是我的文章，我的作品，你说见鬼不见鬼。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821—1881)，俄国大作家。——译者注

② 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译者注